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 机制创新研究

● 杨 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基金项目资助(10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资助(12A055)
湖南省“十二五”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建设学科资助

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 机制创新研究

● 杨 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机制创新研究 / 杨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2084 - 2

I. ①群… II. ①杨… III. ①反腐倡廉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82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陈肖静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75
插 页 2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4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①的精神谋篇布局，对新形势下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机制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群众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监督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它是指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能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相对于体制内监督而言，它是人民群众运用批评、建议、听证、评议、检举、控告等方法，依托一定的法律和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对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所实施的监督。毛泽东指出：“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②邓小平也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③可见，群众监督体现着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当家做主的地位，是人民群众发扬民主、表达意志、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铁的规律：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最严重的腐败。那么如何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在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体系当中人民群众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群众监督的历史渊源如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论述群众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群众监督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思想与中国特色政治构成结合在一起的？监督的法理基础在哪里？面对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新形势下怎样进行群众监督与公共权力监督的机制创新？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是本书研究的内容。事实上，监督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又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监督的本质、特征、作用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是不同的。监督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受经济（主要是经济制度）的制约，这是必须肯定和坚持的。

首先，从历史与逻辑的关联，探讨了古今中外监督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历史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监督，一般认为起源于古代的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始于西周，确立于秦汉，定型于唐，延续至清末。它是封建经济和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究历代王朝兴衰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止政权倾覆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监督。他们认为，监督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必要手段，只有加强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官吏腐败，保持政治清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出了腐败对政权的严重危害性；二是强调了监督是防止和反对腐败，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从哲学层面来说，这种监督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性善论”哲学理念为根基的，更多的强调为官者的道德自我约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种监督思想基础上的监督制度安排，显示出浓厚的人治政治架构。因此，中国古代的监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监督。对于古代西方国家而言，其监督思想和监督制度从一开始便奠基基于“性恶论”的基础之上，由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首倡的人性恶思想与基督教的原罪观相结合，构成了西方监督理论和制度的思想原点。E·博登海默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总结道：“奥古斯丁教导说，人类来世以后，人的本性被原罪破坏了，人类本质中善良的因素虽然没有泯灭，却变得比较脆弱，容易被邪恶的东西所挫败。以前那种爱的秩序让位于这样一种生活状况，即色欲、贪婪、激情和权欲起着明显的作用，于是，死亡之神便降临于人类，作为对其腐败的惩罚。反映人类灵魂完善、绝对善良的自然法不再可能实现了。理性不得不设计出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①由此对人性理性认识而设计出的便是法治下的监督制度。

^① [美]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其次，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群众监督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和政权建设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群众监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革命、政党建设、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公共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思想的基石。人民群众掌握监督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时强调，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国家权力异化的分析和判断，强调要弱化国家，强化社会，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防止国家权力异化和坚持人民监督的思想，结合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所进行的政权建设的实践，“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②进行了艰辛而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群众监督及反腐倡廉理论。

再次，对群众监督的地位和特点进行了法理探讨，厘清其在公共权力监督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借以消除部分人对群众监督的疑虑和困惑，指出其性质、地位、特点及其在对公共权力监督的重要性方面，是其他监督方式无法代替的。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让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但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理想状态的所谓全民自治模式，可行的方案只能是让代议制政府掌握权力，而让人民去监督这种本应反映自身意志和利益的公共权力。群众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审视、检查、督促及评价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过程。这种监督强调了：第一，主体性。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主体地位。第二，权利性。群众监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群众监督是公民依法对其监督权行使的结果并受法律保护，对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种制约。第三，法律性。这里的法理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一是指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应遵循相关法律规定,不应该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离开法律的规定性,监督则称为胡乱的指责,违背监督的本意;二是指群众监督的法律体系建设,要真正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人民群众监督的法律体系建设。党的十五大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七大报告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① 在中国,人民群众是执政党的力量源泉。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执政理念。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② 创新人民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体制机制。要提高群众监督的能力,充分发挥群众在监督公共权力运行全过程的有效性和实效性,关键是要进行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的机制创新。

最后,根据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如何创新群众监督机制,提出把群众监督的形式、内容、手段和方法制度化,确保在国家政权结构中体现执政党的群众路线。需要指出的是,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群众监督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作者在论述群众监督的过程中,运用了最新反腐案例对网络反腐也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和拟解决的问题。如网络反腐只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和补充,要保持网络反腐的常态化,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配套与创新,等等。本书运用了史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原理和方法,对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机制创新进行了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而创新机制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群众监督制度是群众监督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立足于群众监督、社会与政治三方互动关系,将人民群众监督与反腐倡廉、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及民主意识、社会互动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各种思想主张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这一背景下，通过建立健全人民群众监督机制与党组织、与社会群众等多维视角的分析，彰显出建立和健全人民监督机制的极端重要性。企求对丰富反腐倡廉理论建设有所裨益。并在实践上对反腐败斗争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群众监督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监督思想	(2)
一 先秦时期	(2)
二 春秋战国时期	(4)
三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6)
四 明清时期	(8)
五 对中国古代监督思想的评价	(9)
第二节 西方监督理论	(11)
一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12)
二 中世纪时期	(14)
三 近代时期	(1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监督的思想	(19)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监督及群众监督思想	(20)
二 列宁群众监督思想与实践	(25)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主义群众监督思想及其理论的 发展	(33)
一 毛泽东的监督思想及实践：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33)
二 邓小平关于权力监督的论述	(39)
三 江泽民关于权力监督的论述	(47)
四 胡锦涛关于权力监督的论述	(52)
第二章 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基础分析	(57)
第一节 公共权力相关概念辨析	(57)

一	公共权力	(57)
二	公共权力的特征	(61)
三	公共权力的运行	(65)
第二节	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分析	(67)
一	公共权力的异化与腐败	(68)
二	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87)
第三节	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可能性分析	(93)
一	权力属于人民的内在特质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 监督的优势	(93)
二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 提供了土壤	(102)
三	我国法律为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提供了保障	(104)
第四节	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行为规则	(108)
一	罢免	(109)
二	信访监督	(110)
三	举报监督	(112)
四	控告申诉监督	(115)
五	批评建议(监督)	(116)
第三章	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法理探讨	(118)
第一节	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法理基础	(118)
一	“主权在民”原则	(118)
二	代议制民主原则	(119)
三	法治原则	(120)
四	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原则	(121)
第二节	人民群众监督的性质探索	(123)
一	权利观点	(123)
二	权力观点	(127)
三	权力源于权利	(131)
第三节	人民群众监督的基本特征与原则	(134)
一	权力的群众监督和制约的基本特征	(134)
二	完善群众监督机制	(137)

三	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的程序制度	(138)
四	营造良好的群众监督的社会环境	(139)
第四章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分析	(141)
第一节	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特点	(143)
第二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制度性成因	(151)
一	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导致腐败的主要成因	(153)
二	官僚主义的严重存在,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一大缺陷 ..	(156)
三	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是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159)
第三节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之本质探析	(161)
第五章	网络反腐新探索	(166)
第一节	网络反腐的内涵及历史考察	(166)
第二节	网络反腐的特点	(170)
第三节	网络反腐制度创新	(173)
一	客观认识和评价网络反腐的作用及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地位	(175)
二	规范网络反腐主体的揭批行为	(176)
三	规范网络反腐客体的正当权益	(176)
四	将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设计中	(177)
五	以制度理性引导非理性的社会监督行为	(178)
六	加强网络廉政文化建设	(178)
第六章	当前人民群众监督机制中的缺陷与不足	(180)
第一节	监督制度及监督机制缺乏刚性力度	(180)
第二节	历史文化遗产的消极作用	(183)
一	群众监督的现状扫描	(183)
二	群众监督不足的原因分析	(188)
第三节	社会心理的各种因素制约	(193)
第四节	官场亚政治文化的影响	(196)

第七章 建立公共权力运行的人民群众监督机制是反腐倡廉的 治本之道	(203)
第一节 跨越历史与现实之困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203)
一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	(204)
二 党内民主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206)
三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	(211)
第二节 健全人民群众监督的法律机制	(215)
一 加快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立法进程	(215)
二 与时俱进地修订现有的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217)
三 完善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	(218)
第三节 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	(223)
第四节 防止官僚腐败症蔓延的根本途径	(225)
主要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38)

第一章

群众监督理论概述

关于“监督”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为：（1）察看并督促；（2）做监工工作的人。^① 英文 supervision（译为监督）。从解释中不难看出，“监督”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在整个监督系统中处于最显赫、最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统治阶级都把监督作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体制，就难免出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也难以实现。在我国，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不仅包括国家政治机构中上级对其下属的监视和督察，包括专职监督机构对各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制约和制裁，而且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对所有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视和督促。

而人民群众监督又是我国公共权力监督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群众监督是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之一，是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必然要求，理所应当能够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实践上看，群众监督也确实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监督的威力无比巨大，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因素。毋庸讳言，当前群众监督存在各种困难和问题，其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落后于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因此，完善和加强人民群众监督工作，创新人民群众监督机制是完善权力监督体系，强化权力制约的迫切需要。也是反腐败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63页。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监督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创立的权力监督制约思想和法规，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古代中国“君权至上，法自君出”。无论是奴隶还是封建社会，都建立以王或皇帝为主宰的专制主义政体。君主的意志是法律的基本渊源。君主发布的“诏”、“令”、“诰”、“谕”、“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封建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握有一切大事的最后决定权。然而君主权力问题仍然成为圣贤智士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从君主权力的来源、性质、内容、合法性与正当性以及君主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等方面探讨君主权力问题。无论是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在他们的上升时期，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防止政权迅速趋于腐败灭亡，曾经提出许多权力监督制约主张和措施。虽然，所有这些主张和措施，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本性，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的权力错位现象；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的监督制约主张和肃贪倡廉的措施，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和价值倾向的，对促进当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 先秦时期

自西周初始，权力监督问题便开始受到关注。周公旦的“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①可看作中国最早的公民监督思想。周公旦告诫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重视百姓的呼声和要求，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以百姓的喜怒为好恶，以民心的向背为政权安危的标尺。他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在他的思想中，对在权者的“监督”不仅来自于虚幻的“天”，更来自于实在的“人”。以周公旦、召公奭为代表的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开始通过总结夏、商两个王朝灭亡的教训，他们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是致使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必须严加防范，

^① 《尚书·酒诰》。

从而形成自己的反腐败思想，一方面通过告诫的形式，希望最高统治者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以此来消减腐败对政权的危害，将周王朝的统治长久地维持下去。如周公旦在《无逸》中告诫成王及此后的继位者，“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可沉湎于观赏、安逸、游玩和田猎之中，不可贪图“今日耽乐”，不可像商纣王那样“受之迷乱，酗于酒德”。^① 召公奭也告诫成王“其疾敬德”，“其德之用”，务必迅速推行德政，以美德治国，不可荒淫腐败，方能“祈天永命”，使周朝的统治永久保持下去。^②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隐约地认识到监督是防止和反对腐败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监督思想随之萌芽。周公旦在《无逸》的末尾对成王说：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们的周文王这些明智的君主，其所以明智，在位时间所以长久，统治所以稳定，是因为他们听从告谏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有人对他们说：“百姓怨恨且咒骂你”，他们便更加戒慎王德，增修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③。有人指出其过错，不仅不生气，反而自认过而改。显然，周公旦认为，这些“迪哲”的明君之所以有效地防止了腐败行为的发生，以告谏形式出现的监督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周公旦看来，听从劝谏，让这种监督活动存在并保持下去，是防止腐败行为发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在还政于成王后，周公旦还告诫说：“今后选任立政、立事、准人、牧夫”等大小诸臣时，要“克灼知厥若”，即要对其“能察之灼然”，知道他们能“顺其事”，能“勤劳各尽心力”，方可与之共同治理国家。又说：“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俭人。”^④ 以后治国理政，切勿任用奸邪腐败之人为臣。周公旦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要有效地防止和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应当实施监督。不过从总体上看，周公旦的监督思想，其认识的重点仍旧集中于对君主行为的监督上。^⑤

尽管西周初年以周公旦为代表的政治家们的监督思想还存在着明显的

①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无逸》。

② 《十三经注疏·尚书·召诰》。

③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无逸》。

④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立政》。

⑤ 周继中、李玉赋：《反腐败与监督通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缺陷，是不成熟的，也远非全面的，但是，这种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基于周初年反腐败思想之上产生的监督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对后代监督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到西周末年，与周初相比，监督思想有了一些发展，显现出明确化和具体化的趋势。如周厉王时期，召公奭便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是以事行而不悖。”^①显然，召公奭认为，要防止和纠正诸如厉王那样“暴虐侈傲”等腐败行为的发生，只有通过上自公卿，下至庶人的不同形式的监督才能实现。

二 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君权持一种“相对主义”主张，反对绝对君主主义。他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是如果君主违反道义，他主张谏诤。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之，宁犯之。”^②对于有问题的君主，同一事情要敢于批评三次，“三谏之而不听，则逃之”^③。这即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事君之道就是辅佐谏诤之道。“仁”是孔子道德观的核心，是做人 and 从政的根本。孔子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要“爱人”。作为官人，应当“亲亲而仁民”。不管是当官者还是百姓，若是决心向仁德靠拢，也就不会做坏事。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官？孔子说：尊重五种道德，排除四种恶政，这就可以做一个善理政事的好官了。孔子所说的五种美德是：君子给人民以好处，自己却不耗费；使唤百姓，大家都很信服而不怨恨；自己有高尚的追求却不贪污受贿；安稳有风度却不骄傲；有威严却不凶暴。孔子鄙视“四种恶政”：不先教育便加杀戮叫作虐；不先告诫便要求有成绩叫作暴；起先松懈，突然限期完成叫作贼；同是给人以财物，出手吝啬，叫作小气。他认为，为官者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勤快就会有功绩，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孔子自己从政时的廉洁实践情况，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他光辉的政绩中看出他的廉洁。他“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

① 《史记·本记·周本记》。

② 《论语·八佾》。

③ 《礼记·典礼下》。

之”，“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费（弗）饰贾（价），男女行者别于涂（途），涂（途）不拾遗”。

孟子则特别强调君主正心修身为表率。但是如果君主不能主动做到这点，臣下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回谏，“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①。臣下用“如国人”、“如寇仇”的方式对待君主当然也包括批评、声讨、击伐。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观念，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学说，劝告统治者要重视和爱护人民。提出了养心寡欲的思想，主张为政者要带头加强思想修养，“善养吾浩然之气”；要通过“反求诸己”，排除感观物累，保持高尚的节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春秋战国时期，对腐败严重危害性认识的逐步深入，反腐败思想的逐步发展，推动了监督思想的进步。其明显表现是：一方面，继承了西周的监督思想，提出了加强对君主监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反腐败思想表现出对统治机构的两大组成部分——君与臣的腐败行为的同等重视，因而较之西周更加强调对官吏的监督。

春秋中期楚国大臣子亶对楚灵王说：齐桓公和晋文公能使国富兵强，称霸诸侯，是因为有“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这些不同形式的对君主的监督，使齐桓公和晋文公“不敢淫逸”，有效地防止了最高统治者腐败行为的发生，从而使政权得到巩固，国力迅速增强。反之，凡“恶规谏者”，要想保住国家，巩固政权，“不亦难乎”！因此，在子亶看来，对君主的监督是防止腐败发生，使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手段。^② 晋国的师旷在对晋平公论及为君之道时说：作为一国之君，要想治理好国家，使政权得以巩固，除了要有政治远见、任用贤才外，还必须加强对群臣百官的监督，以防止他们的腐败行为对统治构成危害。因此，君主要“广开耳目，以察四方……屡省考绩，以临臣下”^③。始终不能放松对臣下的监督。显然，师旷在这里已经认识到对臣下实施监督的必要性，且十分强调这种监督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也认为：“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即通过

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国语·楚语上》。

③ 《说苑·君道》。